

论济慈诗歌中的启蒙思想及当代意义

马 涛^{1,2}

(1.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2.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天津 300204)

摘 要:21 世纪以来, 英美批评界出现了重评英国经典诗人济慈的热潮, 济慈诗歌中的启蒙思想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他在书信中表达的艺术见解等使他超越了唯美主义诗人的艺术境界, 他的浪漫主义诗歌表现了强烈的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意识, 对当前反思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局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济慈; 启蒙思想; 浪漫主义诗歌; 理性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4-0079-05

21 世纪以来, 英美批评界再现对英国近代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1795-1821)的极高评价, 例如著名批评家布鲁姆提出:“济慈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自莎士比亚以来最受人们普遍赞誉的英语诗人。”^[1]近年来出现重新热评英语文学史上经典诗人济慈的现象并非偶然, 而是由于近来诗评家们深化了对济慈诗歌的再阐释, 从中挖掘到了曾被忽视、甚至被排斥的启蒙主义思想火花, 所以新世纪以来的济慈研究解构了传统批评话语的定论, 为人们重新建构英语经典诗歌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与思考维度。

一、新世纪的反思： 济慈的启蒙主义思想

济慈是唯美主义诗人还是政治诗人? 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曾经颇有争议。但是, 随着济慈的书信被完全整理出版之后, 他的艺术观念和政治思想日益为人们所了解。布鲁姆曾经主张从主体美学的维度来阐释济慈的经典诗作, 而弗玛尼斯则从济慈的诗歌和书信中进一步挖掘到他与启蒙主义思潮的渊源关系。由于济慈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所以尽管他崇尚古典的美感, 但他并不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流派。他的诗歌创作之路是在现实和历史的三重轨迹中行走, 他对美的推崇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在关注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反思中把政治意识和生活体验内化为对艺术和美的思考。

在济慈短暂的 26 载人生中, 他创作了许多辉煌的诗篇, 如他的《希腊古瓮颂》和《夜莺颂》等; 而他

的创作理念与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观念一脉相承, 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崇尚永恒之美, 同时也表现出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他在诗歌中积极追求民主与自由理想, 反对英国王权的专断, 抨击愚民的迷信盲从。他把对艺术美的推崇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相融并置, 从而使得他的诗作超越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境界, 浸润着现代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思想结晶。当时法国大革命的进步思想深深影响了济慈的创作实践, 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有关自由民主和反对专制君主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得到的鲜明的体现。在 1818 年发表的政治短诗“作于五月二十九日——查理二世王朝复辟周年纪念之诗行”中, 济慈以犀利的言辞讽刺了一些封建君主的卫道士, 谴责复辟王朝是文明时代的倒退。诗歌开头写道:“昏头昏脑的英国人, 你们还会公开赞许/给你们带来最可怕的奇耻大辱的暴君?”^{[2][21]}这首诗歌的思想意义非常明确, 其反对专制君主统治的进步主题溢于言表。显然地, 人们从这里已经看不到那种沉浸于古代希腊文明或徜徉在魅力夜景中的诗人济慈了, 而是听到了一个启蒙战士正在发出的正义呼声。

济慈的启蒙思想观念形成与他大量阅读法国和英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有很大的关系。济慈的好友查尔斯·布朗在济慈离世后整理了他的图书和书信, 在各种历史记录中发现济慈长期以来以书为精神向导, 从古希腊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到 16~17 世纪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著作都使他爱不释手。近年来, 库茨克在《济慈的文学传统》一文中提到, 济慈

收稿日期:2012-11-13

作者简介:马涛(1979—), 女, 天津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

十分喜欢阅读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如:伏尔泰、吉本、罗布特森和玛沃等人的著作,从中汲取了启蒙思想的丰富教喻^{[3]12}。正是这些充满新思想的人文著作培育了年轻诗人对于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而这种追求转而对他在诗歌创作中寻求自我主体精神解放的艺术表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倾向正如考德威尔在《幻想与现实》中所指出的,济慈的诗歌虽然营造了“一个浪漫、美好、感性的世界”,但是诗人“渴望逃避现实的心理恰恰表明济慈内心希望凭借诗意的想象来抗衡各种社会纠葛和社会矛盾。”^{[3]10}

这些新的评价指出了济慈诗歌中积极的社会和思想意义,而且与过去的许多评价大相径庭。过去许多批评家认为济慈的诗歌是去政治化的,认为济慈只重艺术审美,不谈政治思想,远离社会现实。评论家布鲁克把济慈的诗歌看作是游离于时代和现实以外的唯美主义之作,认为“直到他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济慈对现实,对整个人类,对有关人类思想的政治运动,对人类的未来,对自由、平等、博爱,都没有多少兴趣。他只关心美。”^[4]弗玛尼斯在其论著《济慈和启蒙思想》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评论家仍倾向于把济慈的思想经历降低为错误的美学观,认为他的诗歌之所以伟大全在于脱离了对政治、社会和历史的关注。”^{[3]10}这样的评价低估了年轻诗人济慈所表现的政治社会意识,却给他贴上了“唯美”和“避世”的标签。这种评价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新批评”本身的缺陷,即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式阐释忽略了文本以外的社会语境和历史因素,曲解了18~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启蒙运动之间的思想关联。

历史学家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指出,研究浪漫主义唯一明智的方法就是耐心的历史方法,即“通过回顾18世纪初期历史,考察当时的局势,然后逐一考察是哪些因素颠覆了18世纪,哪些因素的结合导致了18世纪后期的变化,并引起了迄今为止西方意识最重大的变革。”^{[5]27}柏林的历史主义观点提示我们不仅要细读艺术创作的书写文本,而且要细读历史变迁的社会文本。从历史语境中看待济慈的浪漫主义诗歌,我们不能不把浪漫主义对于主体意志和人性情感的强调视为启蒙思想的另一种表现,进而把浪漫主义以个人为中心的艺术观念和启蒙思想反对贵族专制、主张个性自由的立场联系起来。

19世纪法国批评家泰纳曾认为,浪漫主义是1789年之后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统治的叛乱;是新兴

暴发户的能量和力量,一种绝对相反的能量和力量的表现;是新兴资产阶级以意气风发的姿态对抗历史上陈旧、体面、保守的价值观的表现。布吕内蒂埃则进一步强调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的自我中心主义,是舍弃更大的世界而强调个人,是自我超越的对立物,是纯粹的自我断言^{[5]21-22}。这些看法虽然注意到了浪漫主义对于个人主体自我情感和意志的重视,却没有明确指出早于浪漫主义兴起就已经在欧洲不少国家蔓延的启蒙思想运动对前者的影响。实际上,没有启蒙思想家们对于专制君主和贵族文化的抨击和批判,就不会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崛起,也不会有崇尚个性、赞美自然和摆脱宫廷审美趣味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马歇尔·布朗指出,无论从知识体系还是从审美角度考量,浪漫主义和启蒙思想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浪漫主义绝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否定和反叛,而是对启蒙运动富有成效的总括。我认为,浪漫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成果和觉醒。”^{[6]38}这个认识正是新世纪的济慈批评所达到的某种共识,因为人们开始跳出单纯的文本细读的局限,重新在历史和时代的维度中反思济慈诗歌所体现的启蒙思想观念及其在当代的现实意义。所以说,济慈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来源于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而他对于当时英国社会和君主体制的抨击则直接表现了启蒙思想运动的价值观念。

二、济慈的“消极能力”说与启蒙理性

从思想观念的传承来看,浪漫主义和启蒙思想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历史所形成的,因为启蒙思想家和大多数浪漫主义诗人对于封建贵族文化和君主专制思想都是坚决反对的。济慈的一些诗歌颂扬了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等启蒙思想,体现出诗人对政治和人性的深刻关注。在诗歌《题于对世俗迷信的愤慨》中,济慈把沉闷压抑的钟声与追求自由的心灵形成鲜明对照,既批判了教会对于民众的压制和布道者的伪善,又表达了向往理性和精神解放的愿望。他在诗中写道:

教堂的钟声沉闷地响起……

去倾听布道者讨厌的声音。

人的思维一定被毒咒控制紧紧!

因为人人盲目无情,

抛弃炉边的欢欣,打破柔和的氛围,

去接受所谓心灵的洗礼。

钟声依旧,我感觉一阵寒意……^{[2]5}

这首诗体现了济慈对于旧思想的禁锢的厌恶和

对芸芸众生的不满,但在他的自我中心意识里却有着对于迷信和盲从的清醒认识,而这种认识正是启蒙理性精神所竭力倡导的。实际上,启蒙思想对济慈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意识层面,而且从诗篇的理性表达中呈现了出来。济慈的著名诗论“消极能力”说便是他诗歌观念的凝练,其中包含对自我能力的怀疑论倾向也和启蒙思潮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启蒙思想强调的理性就是要持有怀疑精神去重新审视既有的社会文化观念和秩序,而笛卡尔理性思维方法的第一条就是怀疑一切现有的被思之物以证明“我”的主体存在。

济慈认为,诗人必须具有一种“消极能力”^①才能具有审美原创性。他提出的这一概念来自1817年给他兄弟乔治和托马斯的书信中。济慈在信中写道:

莎士比亚就大大具有这品质——我的答案是消极的能力,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追演下去,得到的结论也许不过是:“对一个大诗人来说,对美的感觉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进一步说,取消一切的考虑。”^{[7]59}

济慈的“消极能力”说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显示了自我反思的理性意识,另一方面强调了诗歌的美感胜过一切其他的考虑因素。或者说,济慈认为诗人首先要感受到某种疑惑或神秘的境地,然后又要在这种状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消除一切妨碍审美直觉的思考,形成某种以自我为起点的怀疑和探寻的能力。从审美知觉的角度看,这就是要求一个人具有“消极能力”的直觉审美感受力,能在不确定和怀疑的情况下体验存在,感知事物的美。这种感受力的着眼点在于怀疑,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近代怀疑论的开创者笛卡尔,并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那里又得到了继承性发挥。斯派瑞曾在一篇论文中阐述了济慈的怀疑主义与伏尔泰思想的关系,认为济慈和启蒙运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重要的思想联系^{[3]8-9}。这种联系的核心就是笛卡尔的思辨哲学方式和怀疑论的立场。

笛卡尔认为,自明的理性思维才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可靠来源,因此他把怀疑看作理性思维进行反思的第一个阶段,而怀疑只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论工具,是经由理性而获得真理认识的途径。可以说,笛卡尔并非主张建立一个怀疑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没

有陷入不可知论的窠臼。笛卡尔的思想影响到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后者的怀疑论涉及宗教哲学、人类理性和灵魂不死的神学教义。伏尔泰一方面把相对真理的观念引入理性思考之中,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积极的怀疑论,而批判了走向虚无主义的怀疑主义。启蒙思想的自主理性观念和浪漫主义的自我中心意识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承认自我主体的思想或情感的中心地位,认为自我具有怀疑、否定及重新建构新观念的积极认识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浪漫主义在启蒙思想中找到了同道。所以,马歇尔·布朗认为“浪漫主义和启蒙思潮——并非相互孤立或者互不理解,而是有共同的根基”。正是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华兹华斯才会挑战自己的老师。而自从笛卡尔开始,“灵魂时刻在思考”这样的信条就已经大受启蒙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信奉和拥护^{[6]39}。其实,济慈在熟读伏尔泰的论著时也接受了启蒙理性的思维方式,例如他在参与有关美洲印第安人身份的争论时采取了人文关怀的立场,并在长篇诗歌《许珀里翁》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从思想倾向来看,浪漫派虽然崇尚情感和想象,强调个性自由,但他们并不轻视理性,更不否认平等和博爱等启蒙价值观。他们所要反对的只是把理性绝对化、教条化的偏向。例如在德国,康德甚至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但是他并不敌视理性,相反,他崇尚科学,主张用严密的逻辑来训练心智,可见理性思考和自由理念并不冲突。

从启蒙理性的角度来看,济慈的“消极能力”说把自由想象和理性反思完美地结合起来,因为他提出的怀疑论不是绝对的否定论,而是黑格尔所谓的一种“高级的意识”。济慈认为,消极的感受力首先要达到“无我”的境界,隐退个性,诗人“要不断地发出信息,去填充其他的实体——太阳,月亮,大海,世界上的男男女女,作为有冲动的生灵,他们都是有诗意的……而诗人却没有,没有自我——他绝对是上帝创造出的最没有诗意的生灵。”^{[7]214}济慈把诗人说成是“最没有诗意的生灵”实际上用自嘲的口吻表达理性的反思,诗人作为审美主体,要超越教条的桎梏,与大千宇宙合而为一。济慈的“消极能力”说是一种积极辩证的认识论,是在怀疑自我与大千世界关系中领悟自然的真谛。济慈所说的怀疑是一种方法论的怀疑,是把这种不确定性看作积极的理性活动的开端。他的怀疑论是对理性意识的反思,本质上具有能动作用,激发诗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当

①国内有些学者把“Negative Capability”译作“否定能力”、“自我否定力”、“客体感受力”或“天然接受力”等。

然,济慈还认为美感应该压倒一切考虑,艺术的目的就是创造愉悦的美,诗歌无须以非艺术的逻辑标准来评判。但是诗人如何来创造美?这就要求诗人具备“消极能力”,主动而理性地隐退个性,对客观保持一种怀疑的距离,适应一切变化并和自然万物产生契合与共鸣,以源源不断的灵感进行创造活动。济慈在书信中说道:“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只除了对心灵情感的神圣性和想象力的真实性——想象力以为是美而攫取的一定也是真的——不管它以前存在过没有。”^{[7][51]}正是这种理性的“消极能力”使诗人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和审美感受力来创造真情实感的艺术形象,即使是古希腊艺术品和神话形象也能激发真实的心理情感,并达到忘我的审美愉悦。

三、浪漫主义诗歌与现代人文理想

济慈的早期诗作洋溢着对政治改革的激进热情,对启蒙理想的大胆期盼,但遭到的攻击和谩骂让他陷入了沉思。在他的“消极能力”说影响下,他把自己的政治感受力和对自由民主的热情深藏在诗歌形象塑造中,追求更深刻、更具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理想。济慈从阅读中汲取的古典文化知识激励了他的创作灵感,他那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力在他的诗歌名篇《希腊古瓮颂》(1819)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济慈在诗中写道:

哦,希腊的形状!唯美的观照,
上面缀有石雕的男人和女人,
还有林木,和践踏过的青草;
沉默的形体呵,你像是“永恒”
……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落,
只有你如旧;在另外的一些
忧伤中,你会抚慰后人说: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8]

这最后一段诗节把艺术美和生活美并置,并从哲学高度讨论二者的辩证关系,把真和美的融合视为永恒。希腊古瓮展现的艺术美是永恒的,唯美的,但是这种艺术美经过岁月的洗礼也会变得冰冷、乏味;古瓮记述着远古的生活面貌,虽然人生无常,但是现实情感永不褪色,是真切的存在。济慈不是唯美主义诗人,他痛苦的人生经验更使他深知艺术替代不了生活,没有生活的艺术是空洞的,不可靠的;但是,他也切身感受到,生活离开了艺术将会坠入苦楚黑暗的深渊,特别是艰辛的生活更需要艺术的美好想象来安抚人的心灵。在济慈看来,“美即是真”,艺术之美脱离不开真实的人生体验;“真即是

美”,用艺术的想象力攫取的逼真存在就是永恒的美。济慈用理性的思辨表达了人生的真谛,而他的诗歌又以饱含人文主义理想的艺术形象给予读者以美感的抚慰和净化。

济慈在写给好友雷诺兹的信件中说道:“年轻时,我们只看到令人愉快的奇迹,一心想永远年轻愉快。但是在这种愿望所产生的诸多结果中,最重要的是使你眼光敏锐,看透人心和人性——让你相信世界充满不幸和伤心、痛苦、疾病和压迫。”^[9]济慈是现代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卖文为生的诗人,而他贫困的生活、染病的身体和沉重的家庭重担使他英年早逝。济慈对于人世悲苦困顿抱有深切的同情与哀伤,他的浪漫主义诗歌中不仅有启蒙思想的理性火花,也有人文主义的人性关怀。可以说,弗玛尼斯近来对济慈的评价恰好指出了这一点。弗玛尼斯认为,人道主义、同情心和感伤主义常常体现在济慈的诗歌中,而这些思想正源自于他对启蒙主义论著的解读,也源于他自己在论述道德评判和人类理智等问题时所传播的启蒙思想。由此可见,济慈对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关注都是启蒙时期各种论争的产物,这些论争曾经困扰着启蒙思想家,也使济慈深有感触^{[3][8]}。在我们今日重温济慈诗作时,他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启蒙价值观念不啻是对20世纪后期文化虚无主义的批驳。

济慈在给乔治夫妇的书信中附上一首十四行诗,诗中写道:“前程无量的星儿呀!——你温柔的光亮与可爱/一定不属于这个黑暗的时代——/因为它太盲目、偏狭和谬误;/你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用那些坚持人间正义的诗歌……”^{[7][248]}这首诗用“星儿”意象代表对自由光明的憧憬,现实的残酷黑暗并不能遮住星儿的光芒,它会勇敢地穿透黑暗,热情的拥抱自由。这是济慈的心灵写照,诗人自己就好比那颗星儿,向往自由与光明,平等与正义的现代社会理想。济慈若非英年早逝,他很有可能成为雪莱或拜伦那样的激越斗士。不过,济慈博览文学经典的经历给了他丰富的想象空间。他读过很多希腊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著作,尤其喜欢荷马、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他在十四行诗《初读恰普曼译荷马史诗有感》中赞颂阿波罗为自由、智慧和理性的化身,是他诗歌灵感的来源之一。

济慈善于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传说中提炼隐喻,而高雅的审美趣味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这些隐喻。据研究,济慈运用和援引过的神话故事很多,其中包括大潘、月神、恩迪米庸、酒神、海波里

庸、风神、海神、主神、爱神和灵魂女神等^[10]。济慈对古希腊文明的痴迷同样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18世纪中后期,“希腊古风”作为文化思潮在欧洲兴起,对当时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观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①。在实际生活中,济慈热爱古希腊艺术,多次观摩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埃尔金雕像群,自己曾画过索西比奥斯花瓶的速写,他还从好友画家海顿的绘画中也吸取创作灵感,如此丰厚的生活积淀和体验培养了他独特的审美品位,创作了经典诗篇《希腊古瓮颂》。对于济慈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而言,艺术作品不单再现了希腊文化的纯美,还表达了古希腊人崇高的审美理想,折射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境界。他们的审美趣味来自于对物质世界和精神内涵的情感投入,显示出一种自发的,强烈要求回归人性的感情。也许因为诗人们站在与现代工业社会疏离的立场上,他们的审美趣味过分强调对理性和逻辑必要性的否定,这就赋予了他们一种时代的印记。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现代化的态度让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通过书写反话语来表达回归自然的呼声。正如伊格尔顿评论济慈时所言,浪漫主义“诗歌成了对主宰话语的一种抵抗力量,那些主宰话语,用济慈的话来说,对我们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宰制企图’”^[11]。

伊格尔顿把浪漫主义文学写作视为一种反话语写作,是为了反对脱离人性,因此他高度评价了济慈对这种反话语模式所作出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说,济慈对于古典美的追求也是一种抵抗主宰话语的政治姿态。所以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屠岸认为,“济慈的民主精神不限于具体的政治事件。在他的一些诗篇中,民主意识表现得十分宽泛。”^[12]正是这种民主意识、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等等集合而成的启蒙思想和人文关怀赋予了济慈诗歌的当代意义,因为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常常看到激进观念对于启蒙运动和理性精神的否定与蔑视。

四、结 语

“浪漫主义不是仅仅反对或推翻启蒙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而是力求扩大它的视野,并凭借返回一种更为宽广的传统——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中古的和原始的传统,也是现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传统,来弥补它的缺陷。”^[13]这个评价正确地解说了浪漫主义文学与启蒙思想的内在相通的血脉关

系,而济慈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现代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诗歌中反对专制王权和对愚众的控制,他对古希腊人文精神无限向往,他热爱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他的诗歌中的审美意象表达了强烈的启蒙观念和主体意识。重读济慈的诗歌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英美文学经典的艺术价值,而且再次表明了我们仍然置身于启蒙思想和现代理性的语境之中。这也是济慈诗歌在当代西方文学进程中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BLOOM H. Genius [M]. New York: Warner Books, 2002:395.

[2] 约翰·济慈. 济慈诗选 [M]. 马祖毅,审译,任士明,张宏国,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

[3] FERMANIS P. John Keats and the ideas of the enlightenment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章燕. 走向诗歌审美的人文主义:谈济慈诗歌中的社会政治意识与其诗歌美学的高度结合 [J]. 外国文学评论,2002(4):67-75.

[5] 以赛亚·柏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 [M]. 吕梁,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 BROWN M. Roman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M]//STUART C. British Romanticism. Shanghai: Shan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ntion Press, 2001.

[7] 约翰·济慈. 济慈书信集 [M]. 傅修延,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8] 查良铮. 穆旦译文集 3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8.

[9] 安妮特·T. 鲁宾斯坦.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从彭斯到兰姆 [M]. 陈安全,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63.

[10] 常耀信. 英国文学通史:第二卷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115.

[11] 特里·伊格尔顿. 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M]. 郭国良,陆汉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40.

[12] 约翰·济慈. 济慈诗选 [M]. 屠岸,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3] 田薇. 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16):6-10.

①Hellenism 具有多重含义。1836 年,德国古典学家德罗伊森“发明”了“Hellenismus”一词,用来表示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文化的扩张与传播,即我们熟知的“希腊化时代”。